

# 山东地区吴文化遗存分析

刘延常<sup>1</sup> 曲传刚<sup>2</sup> 穆红梅<sup>3</sup>

(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山东济南 250012;

2、3.山东省新泰市博物馆 山东新泰 271200)

**内容提要:**在山东东南部和鲁中山区南部,发现了以剑、矛、戟、戈等兵器为主的春秋晚期吴文化遗存。对照文献记载,可以证明当时吴国与山东地区许多古国有较多的交流与联系,吴文化与齐鲁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

**关键词:**山东地区 吴国兵器 文化交流与影响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齐鲁文化以山东地区的齐、鲁、莒文化及相关古国文化遗存为主体,同时吴、越、楚、晋、燕文化及相关古国文化遗存或文化因素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它们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使齐鲁文化成为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地域文化,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有核心地位。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都证明了吴文化对齐鲁文化产生过诸多影响。

## 一 山东地区发现的吴文化遗存

检索目前已发表的资料和笔者在实际工作中考察到的实物,吴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山东东南部和鲁中山区南部。现将有关发现情况介绍如下。

1、1965年,平度县征集吴王夫差剑1件<sup>[1]</sup>。剑身相对较宽,锋尖,剑身起脊,前铎内收。剑身有铭文2行10字:“攻吴王夫差,自乍其元用。”通体长57.8、宽5.4厘米(图一:1)。

2、1991年4月,邹城城关镇朱山西侧的二级台上出土吴王夫差剑1件<sup>[2]</sup>,沟西壁有墓坑残壁痕迹。剑通长60、宽5厘米,圆首,圆茎、双箍;格作兽首倒凹字形,原嵌有绿松石,已脱落,剑身瘦长,锋尖,隆脊,斜从而宽,前铎收狭,铎锋锐利。剑身有铭文2行10字:“攻吴王夫差,自乍其元用”。

3、1983年1月,沂水县诸葛镇1座古墓出土吴王剑<sup>[3]</sup>,伴出铜舟1、戈1、镞5件和陶器等,此墓为

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残宽3.6米。铜剑通体呈墨绿色,剑刃锋利,剑身长30、宽3~4厘米。剑身无饰纹,中部起凸脊。断茎残存3厘米,呈扁圆形。剑身两侧有铭文2行16字,阴文篆书:“攻吴王乍元已用,□又江之台,北南西行。”(图一:2)。根据伴出器物的形制判断,此墓应属春秋晚期。

4、1982~1983年,在临沂市凤凰岭发掘1座大型东周墓葬<sup>[4]</sup>,包括器物坑、车马坑,墓口长11.2、宽9.45米,出土兵器172件,其中器物坑出土2件矛:长窄叶,身起棱脊,椭圆形銎直透前端、尾部呈半圆双尾叉形;1件饰暗菱形纹,1件为素面(图一:3)。该墓年代为春秋晚期。

5、1993年4月,在莒县东莞镇大沈刘庄清理墓葬1座<sup>[5]</sup>,墓长5.88、宽4.72米,属中型墓葬。随葬陶器有鼎、豆、敦、壶、扁壶等,铜器有剑、戈、矛、带钩、车害、马衔等。其中铜矛1件,两翼较宽,菱形,突脊,矛身饰有几何形暗纹,残长26.1厘米(图一:4)。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晚段。

6、新泰市周家庄东周墓葬出土较多吴国兵器<sup>[6]</sup>。根据墓葬结构、埋葬习俗(如流行殉葬狗、流行腰坑)、随葬品组合(多呈偶数组组合)与形态以及出土大量兵器等分析,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是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齐国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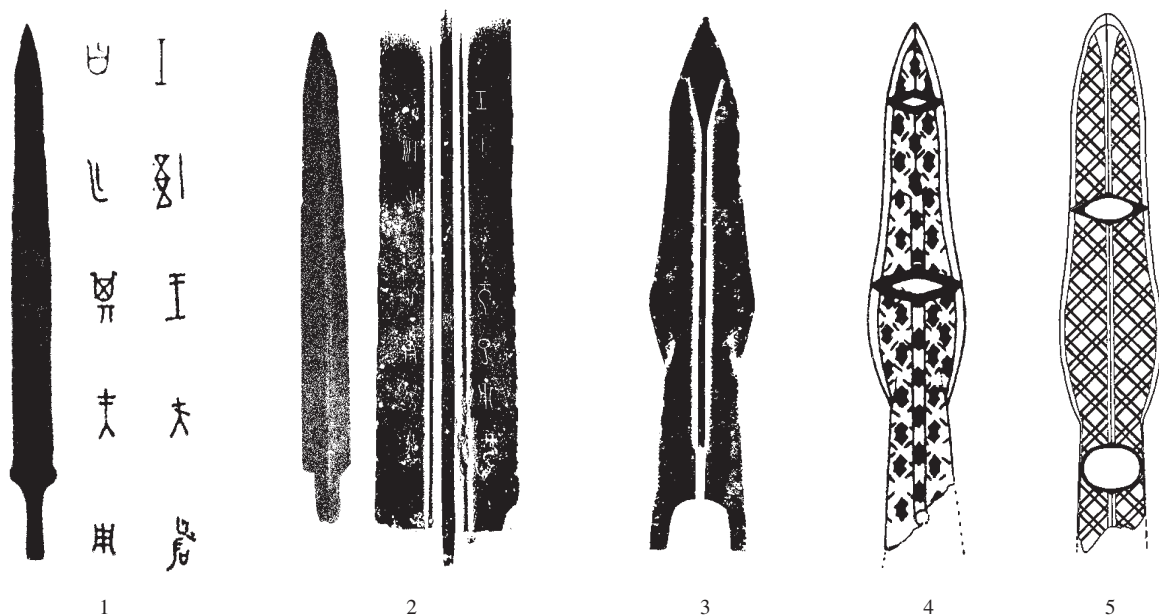
已发掘的78座墓葬中,有42座随葬青铜兵器,

收稿日期 2009-11-25

作者简介 刘延常(1966~),男,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商周考古、东夷文化。

曲传刚(1961~),男,山东省新泰市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山东考古、博物馆。

穆红梅(1969~),女,山东省新泰市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山东考古、博物馆。



图一// 山东地区出土吴国兵器

1.平度征集吴王夫差剑及铭文摹本 2.沂水出土吴王剑及铭文 3.临沂凤凰岭出土矛  
4.莒县大沈刘庄出土矛 5.新泰市周家庄出土矛(M61:1)

共350余件,有戈、剑、矛、戟、殳、铍、匕首、钺、钺、鐙和镞。随葬兵器的多少是区分身份等级的主要标准之一,随葬兵器越多,墓葬规格越高。其中有10座墓葬随葬17件吴国兵器,有剑13、戈2、矛1、戟1件。

(1) 剑 13件。有的剑身饰暗菱形网格纹、首为同心圆纹、格镶嵌绿松石,剑身银白色、硬度高、锋利,有铭文剑、双色剑等。

M2:24,剑身饰暗菱形网格纹,首为同心圆纹,格镶嵌绿松石(图二:1;彩插四:4)。

M61:3,剑首为同心圆纹,格镶嵌绿松石。

M1:54,剑身饰暗菱形网格纹,格镶嵌绿松石(图二:2)。

M1:55,剑首为同心圆纹,格镶嵌绿松石。

M4:14,剑脊宽血槽、两侧饰对称双色长方形暗纹,格镶嵌绿松石(图二:3)。

M1:56,剑身饰暗菱形网格纹。

M52:2,剑身为银白色、硬度高、锋利,首内侧残存同心圆内圈。

M65:19,扁圆形茎、中空,凸棱形脊,剑身银白色,硬度高,锋利。

M11:23,扁茎,线形剑脊,横断面为菱形。剑身修长,银白色、硬度高、锋利,腊部下端脊两侧

铸有2行14字“攻吴王诸樊者反,之子通自作元用”(彩插四:3)。

M38:37,扁茎,凸棱形剑脊,剑身银白色、硬度高、锋利。

M10:6,短剑,无格,凸棱脊,剑身银白色、硬度高、锋利。

M1:53、M1:57,均残,剑脊为铁青色,两侧暗红色(彩插四:2)。

(2) 矛1件 M61:1。矛身饰暗菱形网格纹(图一: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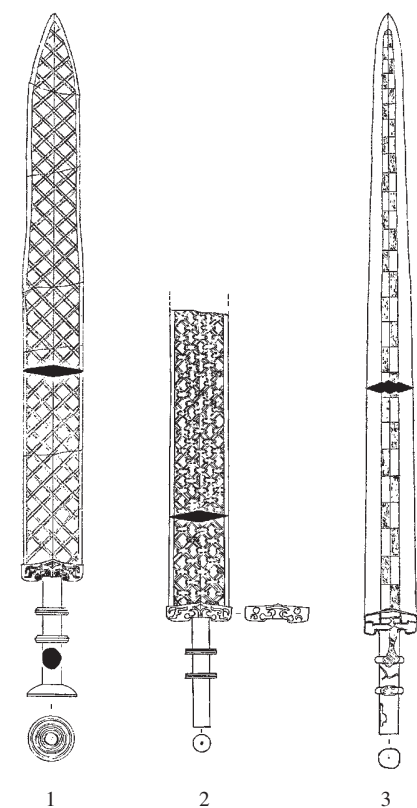
(3) 多戈戟 1件。M3:37~39,由大小递减的3件戈组成。两件无内,均呈暗红色;一内部饰蟠螭纹,上端有鼻饰(图三:1、2、3;彩插四:1)。

(4) 燕尾戈 2件。M56:2~3,内呈燕尾状(图三:4)。

7、1957年在临沭县北沟头遗址出土1件印纹硬陶罐<sup>[7]</sup>,口径12.7、底径12.1、高14.1厘米(图四)。

8、1986年在临朐县冶源镇湾头河村发现1座古墓<sup>[8]</sup>,长27、宽16米,出土陶罐1、剑2、戈2、铍6、车害2、马衔2件等,其中一剑身瘦长、凸脊,扁茎,自茎至前鋒全身饰凸点纹。长54.3、茎5.2厘米。时代为春秋晚期。

另外,在莒南县、滕州市博物馆文物库房还见



图二// 新泰市周家庄墓葬出土吴国青铜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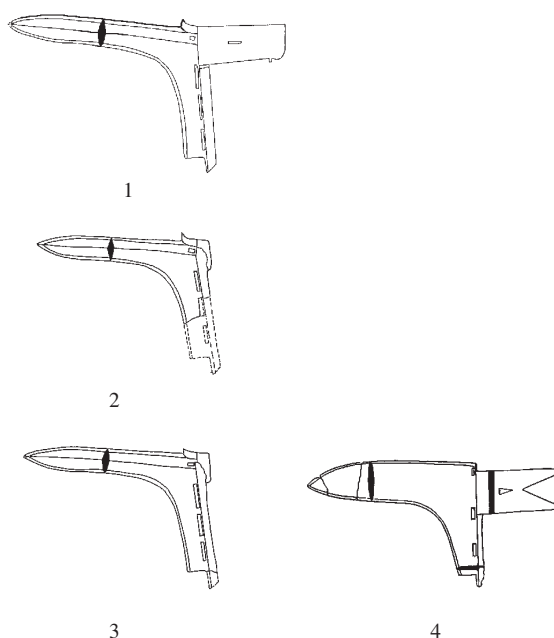
1.M2:24 2.M1:54 3.M4:14

到几柄剑,圆首内为同心圆,圆茎、双箍,厚格、镶嵌绿松石。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在平度县、沂水县、莒县、莒南县、新泰市、邹城市、滕州市等地发现有吴文化遗存,以兵器为主,亦有个别印纹硬陶。主要分布于泰沂山脉以南的鲁东南和鲁中南地区,个别出土在胶州湾以北地方,其中尤以新泰市周家庄东周墓葬出土兵器最为集中。

## 二 吴文化遗存的特征与年代

山东地区吴文化遗存以兵器为主,它们铸造精美,保存较好,诸多宝剑级别较高。兵器的形制、纹样、铸造工艺等如剑首饰同心圆纹(一般11周)、剑身与矛叶饰菱形纹、复合剑都是典型的吴国兵器特征,更有几件剑的铭文直接表明属于吴王和太子。上述兵器绝大部分出土于墓葬,其中大型墓1座、中型墓2座,其余为中小型墓葬。墓葬随葬兵器较多,同时伴出车马器等,随葬品比较丰富,墓葬规格较高,说明墓主都是贵族,一般为士一级,亦有大夫、小诸侯国君墓等。根据墓葬结构、葬俗、



图三// 新泰市周家庄出土多戈戟

1、2、3.多戈戟(M3:37、38、39) 4.燕尾戈(M56:3)

随葬品组合及形态等判断,出土吴国兵器的墓葬属于齐国、莒国、邾国、邾国等。

根据对吴国兵器本身、墓葬随葬品组合尤其是陶器的分析,兵器的年代一般比墓葬年代要早,有长时间多次使用的痕迹,我们认为,由于吴国兵器优良,将士均爱不释手,因而长期使用。

新泰周家庄M3出土多戈戟是典型的吴国兵器,由三戈组成,第二、三戈无内,援狭长,长度由上而下依次递减,胡上端有鼻饰,与江苏谏壁王家山出土的双戈戟相近<sup>[9]</sup>,年代应为春秋晚期偏早;M3随葬绳纹陶鬲及出土其他器物,在墓地中较早,墓葬年代可定为春秋晚期。李学勤先生从铭文的结构与流行用语、“工吴”字体的特点等方面分析,认为沂水出土吴王剑的年代为春秋中晚期<sup>[10]</sup>;从墓葬出土的莒文化陶鬲形态分析,属春秋晚期,如此,可以将其年代大致定在吴王寿梦的晚期或吴王诸樊时期。新泰周家庄M11出土吴王诸樊之子通剑,从“攻吴”字体分析其年代应晚于沂水出土吴王剑,铭文本身也说明此剑为诸樊的儿子铸剑,任相宏先生推断此剑的年代在诸樊为王时所铸(公元前560~前548年)<sup>[11]</sup>;从M11随葬的绳纹陶鬲、鼎、豆、罐的形态分析,墓葬年代属春秋晚期,比“吴太子剑”的年代晚。以上3件吴国兵器均出土



图四// 临沭北沟头遗址印纹硬陶罐

于墓葬中,与它们共出的随葬品铜器、陶器的年代则都比吴国兵器的年代略晚。临沂凤凰岭墓葬属春秋晚期,出土矛的形态也较早,明显比夫差早一个时期;莒县大沈刘庄墓葬为春秋晚期晚段,出土矛也略晚;新泰周家庄M61随葬绳纹陶鬲等,年代应为春秋晚期晚段,出土矛也晚于凤凰岭墓葬矛的年代。从随葬陶器及有关随葬品的组合与形态分析,新泰周家庄出土吴国兵器的墓葬中M11、M3、M10、M61的年代为春秋晚期偏晚阶段,M2、M38、M52、M56为春秋末期,M1、M4、M65为战国早期。周家庄M56出土的两件燕尾戈与河北省邢台市葛家庄10号墓出土的错金鸟篆文戈<sup>[12]</sup>的形制基本一致,年代定为春秋末,李学勤先生释读称为“玄鏐戈”,认为是吴国兵器<sup>[13]</sup>。与此戈相近的还有1980年在山西忻州上社村出土的“玄膚戈”,铭文亦为错金鸟篆文,年代为春秋之际,是吴国兵器无疑<sup>[14]</sup>。

### 三 山东地区吴文化遗存相应的历史背景

山东地区吴文化遗存的年代集中在吴国崛起之后和争霸时期,与《春秋》、《左传》、《国语·吴语》、《史记》、《吴越春秋》等文献记载吴国和山东地区古国之间往来交流(包括会盟、战争、人员往来等)的时间相符,吴文化遗存出土的区域也主要集中在鲁东南地区、鲁中南地区,反映出了基本的历史事实。

#### 1. 会盟

春秋中晚期,吴国强大之后与中原及山东地区的古国开始联系。

寿梦元年(公元前585年),寿梦称王,北上中原,朝见天子,与齐、鲁、晋、宋、卫、郑等国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会见,鲁成公详尽地陈述了周公制

作的礼乐,并演奏了夏、商、周三代的乐曲<sup>[15]</sup>。寿梦十八年(公元前568年),吴国在戚地(今河南濮阳)与鲁、宋、陈、卫等国会盟;二十三年(公元前563年),与齐、鲁、薛、宋等国在柤地(江苏邳县)会盟。

《春秋》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十有四年春(诸樊二年),王正月,季孙宿、叔老会晋士句与齐人、宋人、卫人、郑公孙蚤、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吴于向地(今安徽怀远)。”《左传》襄公十四年:“十四年春,吴告败于晋。会于向,为吴谋楚故也。”

《左传》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夏,公会吴于郕(今山东枣庄东)。吴来征百牢。”《史记·鲁周公世家》:“七年,吴王夫差强,伐齐,至缙,征百牢于鲁。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以礼诎之。吴王曰:‘我文身,不足责礼。’”

《左传》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公会吴于橐皋(今安徽淮南淝道县)。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

《左传》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夏,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于黄池。”吴、晋争先歃血,最后吴国争得霸主地位。

#### 2. 人员往来与交流

《左传》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公元前486年,夫差组织人力修筑邗城,开挖邗沟,把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连通。《国语·吴语》:“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公元前483年又将邗沟向北延伸到沂水,向西开拓到济水,目的是开水道北伐,也因此与山东地区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

《史记·吴太伯世家》:“余祭三年(公元前545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

“四年,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去鲁,遂使齐。”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这就是著名的“季札挂剑”的故事,可见吴国宝剑的吸引力。

《吴郡图经续记》:“吴王阖闾建城之始,立陆门八,以象八卦……北曰齐门者,齐景公女嫁吴世子者,登此以望齐也。”吴太子波娶齐景公之女,阖闾城北门取名“齐门”以慰齐女思乡之心,死后又



将其葬于虞山之顶以纪念。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名显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公元前512年，伍子胥推荐孙武到吴国，拜为将军。孙武严格教宫女练兵的故事家喻户晓。

《史记·吴太伯世家》：“鲍子与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吴、鲁伐齐南方。鲍子弑悼公，赴于吴。”

《左传》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吴国在哀公十一年伐齐之前，伍子胥力谏吴王不能伐齐，但吴王不听，于是伍子胥“私使人至齐属其子，改姓为王孙，欲以辟吴祸”。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子贡受命出使齐、吴、越、晋，利用儒家学说游说，促成吴国北伐齐国，决战艾陵，大败齐师。达到了“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有变”的目的与效果。

### 3. 战争

《左传》成公七年（寿梦二年，公元前584年）：“七年春，吴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迫使郟与吴媾和。当时，季文子虽然称吴国为蛮夷，但足见吴国已经强大。

《左传》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秋，伐邾……师宵掠，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邾茅夷鸿以束帛乘韦，自请救于吴子。”

《左传》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三月，吴伐我。”吴军攻鲁，经武城（今山东费县西南），走险道攻占东阳（今山东费县境），与鲁士军战于夷（今山东泗水境），杀鲁二将，进抵泗上。鲁国与吴国签定和约后吴军退还。

《左传》哀公八年：“齐侯使如吴师，将以伐我。乃归邾子。邾子又无道，吴子使大宰嚭子馀讨之。”这次是吴国讨伐邾国。

《春秋》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公会吴伐齐。”《左传》哀公十年：“公会吴子、邾子、郟子伐齐南鄙，师于郟。齐人弑悼公，赴于师。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

《左传》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公会吴子伐齐。五月，克博（今山东泰安东南），壬申，至于赢（莱芜西北）……甲戌，战于艾陵（莱芜东北，一说泰安东南），展如败高子，国子败胥门巢。王卒助

之，大败齐师。获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献于公。”这就是著名的艾陵战役，前期齐军与吴军互有胜负，最终齐军大败。

### 4. 山东地区吴文化遗存分析

从文献记载看，吴国崛起之后不久就与山东地区的古国（齐、鲁、莒、邾、向、滕、薛、邾、小邾等）开始了密切的联系，直至吴国灭亡也没有间断，主要集中于两大时间段内：一是寿梦称王之后到诸樊诸王时期，这个时期的联系主要是友好的、和平的，包括会盟、出使、婚姻、人员往来等；二是阖闾、夫差称霸时期，以战争方式为主。

从出土文物分析，山东东南部在春秋时期属莒文化分布区域<sup>[16]</sup>，包括莒国、邾国、郟国、向国等古国，出土较多的吴国典型器物如临沭县出土的印纹硬陶罐、沂水出土的吴王剑以及临沂、莒县出土的青铜矛等，说明春秋晚期吴国与这一区域联系比较密切，应以友好交流为主。

根据新泰市周家庄墓葬、新泰市一中出土陶文等文化遗存分析，我们认为周家庄一带是鲁国的“平阳城”<sup>[17]</sup>。春秋晚期，齐国向南扩张争霸，占领“平阳城”作为军事重镇<sup>[18]</sup>，作为齐国的“南鄙”与鲁、吴等国展开军事争斗。周家庄东周贵族墓葬出土较多的吴国兵器，年代集中在春秋晚期晚段，正是齐国与吴国交往的历史证明。这些吴国兵器有的作为珍品馈赠，之后又长期使用，更多的或许是战利品。

### 四 结语

目前在山东地区发现的吴文化遗存以兵器为主，《考工记》、《吴越春秋》、《越绝书》、《国语》、《战国策》等诸多文献记载，吴国极其重视青铜兵器的冶铸，铸造的青铜剑名冠诸侯国，被当时的贵族、将士视为珍品。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出土不少吴王剑，证明了吴国活动、交流的区域。山东地区出土大量吴国兵器印证了文献记载。

吴国与山东地区诸多古国有多种方式的联系和交流，相互之间产生了深远影响。学界期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去印证和阐释这段历史，可以从历史学、民俗学等多方面、多角度对之进行研究。

山东地区与江淮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密切联系，到商代、西周中期，苏北、鲁南地区还是夷人文化分布区，是南北文化交汇、与中原文化交汇的地区，今后应加大考古工作的力度，促进吴文化与齐鲁文化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

- [1] 山东省博物馆编:《山东省博物馆藏珍》,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 2005 年,第 49 页。
- [2] 胡新立:《山东邹县发现一件吴王夫差剑》,《文物》1993 年第 8 期。
- [3] 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县发现吴王青铜剑》,《文物》1983 年第 12 期。
- [4] 山东省兖石铁路文物考古工作队:《临沂凤凰岭东周墓》,齐鲁书社 1988 年。
- [5] 张开学等:《山东莒县大沈刘庄春秋墓》,《考古》1999 年第 1 期。
- [6] 刘延常等:《山东新泰周家庄东周墓葬出土大量吴国兵器》,《中国文物报》2003 年 11 月 5 日第 1 版;《齐国墓再现春秋争霸——山东新泰周家庄东周墓葬》,《文物天地》2004 年第 2 期。
- [7] 2007 年 11 月,笔者在莒南县博物馆文物库房考察时注意到这件印纹硬陶罐,并蒙莒南县博物馆文物保管人员介绍。
- [8] 宫德杰:《山东临朐县湾头河春秋墓》,《考古》1999 年第 2 期。
- [9] 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文物》1987 年第 12 期。
- [10] 李学勤:《试论山东新出青铜器的意义》,《文物》1983 年第 12 期。
- [11] 任相宏等:《吴王诸樊之子通剑及相关问题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04 年第 5 期。
- [1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邢台市葛家庄 10 号墓的发掘》图五:2、3,《考古》2001 年第 2 期。
- [13] 李学勤:《论邢台葛家庄玄鏐戈》,《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 [14] 陶正刚:《山西出土的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图六,《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文集》,两木出版社 1997 年;李学勤:《论邢台葛家庄玄鏐戈》,《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 [15] 东汉·赵晔原著、薛耀夫译注:《吴越春秋译注》,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下同。
- [16] 刘延常等:《莒文化探析》,《东南文化》2002 年第 7 期。
- [17] 《春秋》宣公八年:“城平阳”,杜预注:“今泰山有平阳县。”
- [18] 刘延常等:《山东省新泰市周家庄周代墓葬出土兵器的初步研究》,《孙子的军事思想与中国古代军事历史论文文集》,中国公共安全出版社 2007 年。

## Analysis of Wu Cultural Relics in Shandong Area

LIU Yan-chang<sup>1</sup> QU Chuan-gang<sup>2</sup> MU Hong-mei<sup>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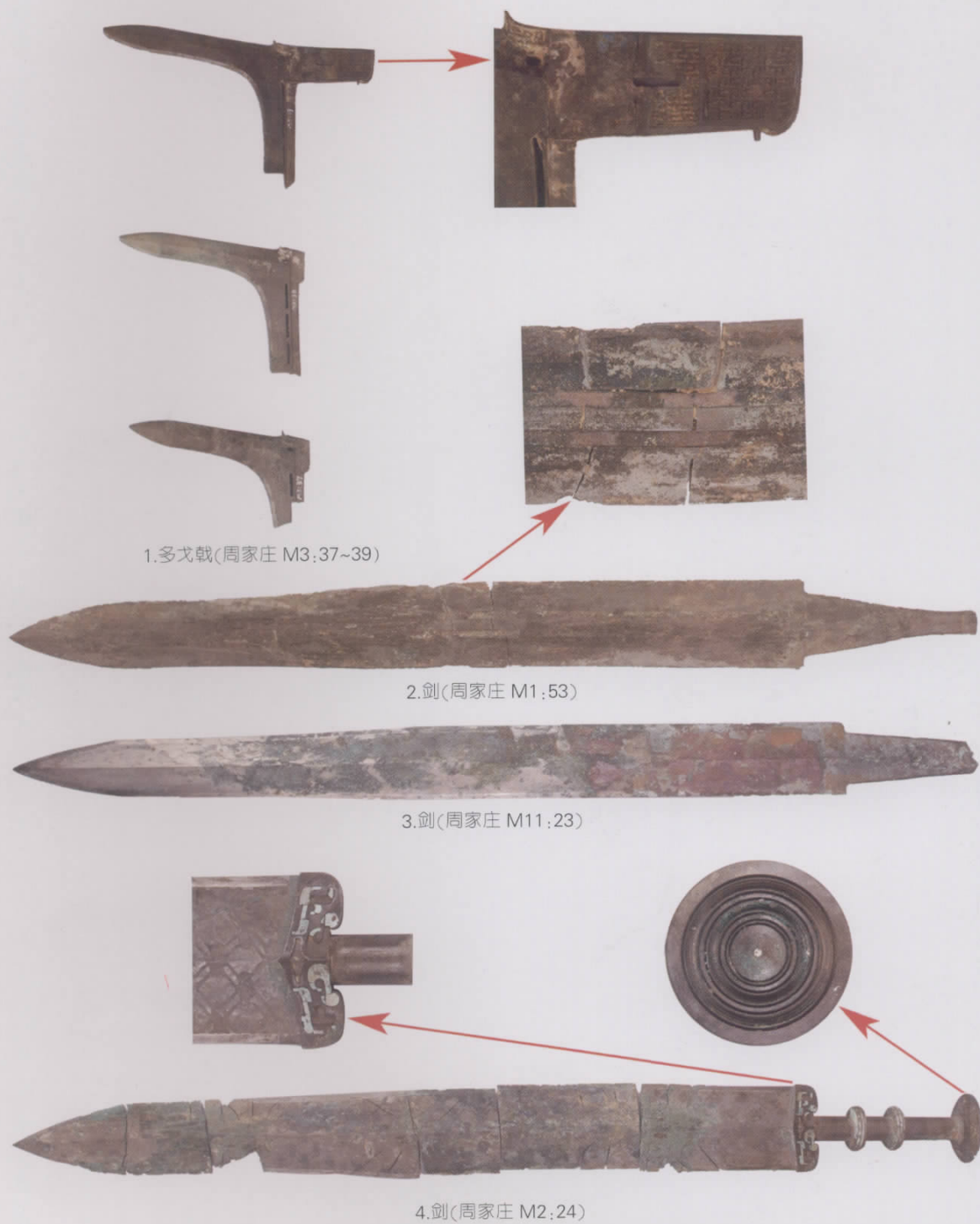
(1. Shando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Ji'nan, Shandong 250012;

2、3. Xintai Museum of Shandong, Xintai, Shandong 271200)

**Abstract:** A number of Wu cultural relics, most of which were swords, spears, halberds, Ge-weapons of the later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he southeastern Shandong and the south part of mountain area in middle Shandong. They, in the light of literatures, could prove that there were much exchange and contacts between Wu and many ancient states in Shandong area. The interaction and fusion between Wu Culture and Qilu Culture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Shandong area; weapons of Wu State;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 山东地区吴文化遗存



(文见第 51 页)